

明清时期中韩文化交流概况

吴莲姬

中韩两国作为一衣带水的国家，历来频繁交往，关系密切。中国的明清时期（1368~1860）相当于朝鲜的李朝时期（1392~1910），当时中朝两国在政治上保持了比较友好的关系，尤其是明朝于公元1592~1598年间两次派大军援助李朝击退倭寇，取得抗倭援朝战争的胜利，不仅进一步巩固了两国的友谊，而且为日后两国的文化交流与发展奠定了基础。研究历史上两国的关系与文化交流，对于加强理解目前日益密切的中韩关系与交流互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明清时期的中韩文化交流，表现在很多方面。本文将主要围绕学术交流和文人之间的交流进行阐述，而这些交流又是通过两国的使臣往来进行的。自李朝建国后，朝鲜对明朝采取了事大主义政策，主要体现在李朝政府每年向明朝派遣“朝贡”赴京使团。清朝初期，李朝与清朝建立宗藩关系后，沿袭明朝制度，也派使臣向清朝称臣纳贡。其赴京使团每年有定期和不定期两种。据统计，从1637年到1850年的213年间，李朝以各种名义向清朝派遣了615次使团，平均每年达2.84次之多，其中使团最多的一年有13次。而同一时期（1638~1850）清朝向李朝派遣的使臣为160次，平均每年仅0.74次。^① 朝鲜赴京使团的成员大致可分为两等，即正官和仆从。正官包括使臣、译官、军官、日官等品官30余人。使臣有正使、副使、书状官等。通常使团人员有300多名。^② 使团从汉城出发，渡过鸭绿江，经辽阳、盛京、广宁、山海关，到达北京。他们在北京逗留的时间大概是1~2个月，来回大约需要5~6个月的时间。

一 明清时期的中韩学术交流

1. 图书交流

明清时期，李朝积极吸收中国文化，热心提倡中国学术。李朝开国后也沿袭前朝实行科举制度，考试内容仍是中国的五经四书之类。科举的实行和汉文学的学习，自然需要大量汉文书籍，李朝便从中国输入大量汉文图书，通过与明清活跃的图书交流，促进和发展了自己的文化。至于李朝致力于图书交流的主要原因，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朝鲜王朝是以儒教，尤其是以朱子学为治国理念的国家，是立足于儒教基本原理，以王道政治思想为目标的国家，所以出于性理学之价值的追求，不能不引入中国的经史类书。中国典籍的输入，对理解儒教经典的价值和建设君主制度之下的王道政治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高度重视典籍、图书效用价值的朝鲜王朝，很早就为贵重书籍设立了弘文馆、春秋馆等，并建立了藏书制，施行内藏书“藏书印制”。一般图书分藏于艺文馆、成均馆、典校署等处，形成了系统的国家图书管理体制。贵重图书的采购活动拓展到中国，发展为图书贸易。当时，李朝王室和宫中收藏了各种国内外的贵重图书，广泛应用于国情研究和学术活动。

^① 朴真奭：《中朝经济文化交流史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7~98页。

^② 张存武：《清代中韩关系论文集》，台北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07页。

第三，士大夫阶层追求儒学修养的深化和对异学书籍的好奇。朝鲜两班知识阶层对儒学学习、探求的欲望很强烈，对异学的兴趣也很浓厚，接触到阳明学，渗透到汉译西学。为了满足士大夫阶层活跃的学术活动，从中国引进传统儒学势在必行。

第四，“两乱”以后，徐徐抬头的中等阶层身份的提高和经济状况的好转，激发了社会低层的文化需求。

图书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在明清时期成为文化传播的主要手段和工具。明清时期中国的汉文献东传到朝鲜，主要通过以下三大渠道。首先是皇帝赐书。明清两代赐书有 600 本，李朝世宗 15 年（1433 年），明帝赐给朝鲜国王《五经四书大全》一部，《性理大全》一部，《通鉴纲目》二部。^① 康熙在 1712 年赐《全唐诗》、《佩文韵府》、《古文渊鉴》等共 379 册。^② 其次是私赠。1736 年金在行随使团来京，钱塘潘庭筠曾将清初诗人王士禛的《感旧集》一卷赠予金在行。1809 年金正喜随其父金鲁敬来京，结交当时学术前辈翁方纲、阮元等。回国后金正喜每年托人赠给翁方纲父子一些字画、古董等礼物，翁方纲也送他一些著作和新出版的图书。尽管私赠的数量很有限，但内容多为李朝学者所喜爱。再次是购书。李朝历代政府为了促进儒教文化，不遗余力地从中国收购汉文图书，并制定了一系列措施。如规定翰贡人员购得好书将受到奖赏等。尤其是李朝世宗年间，为了振兴学术，整顿文物制度，开展了对明朝的购书活动。购入的书籍最初以经史、诗赋和古籍为主，后来扩及稗说杂记、宗教书籍等。清初，由于中韩关系一度不和睦，清政府曾禁止史书外流，但李朝使团人员无孔不入。康熙末年，禁令有所放松，于是朝鲜使团大量收购各种书籍。1720 年，李宜显一次购书 52 种 1415 卷，1732 年又购书 19 种 400 余卷。1778 年徐浩修等购得《图书集成》一部 5020 册。^③ 此外，有的人采购不到，往往开列目录，请人按目代购。如 1801 年随使来京的朴齐家、柳得恭等请纪昀向江南代购朱熹的善本书。通过这些渠道，李朝获得了各种古籍文献，其种类和数量之多，任何朝代都无法比拟。

清代，朝鲜使团在京购书，一般是在琉璃厂书

肆。琉璃厂作为当时最大的图书集散地，吸引了很多朝鲜使团成员。1765 年洪大容进入北京，走访琉璃厂书肆后，为这里所藏的大量书籍所惊叹。琉璃厂也是中韩文人切磋学术的场所，1778 年以后朴齐家作为朝鲜赴京使团成员曾先后 3 次到过北京，1790 年他与柳得恭等人一起来琉璃厂，与清朝学者连日约会探讨学问。

2. 思想文化的交流

(1) 语言文字交流。中韩学术思想文化的交流，得益于汉字在韩国的传入和使用。正是由于汉字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作为韩国人民进行书面交流的工具，中韩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很早就从物质文化深入到精神文化。李朝建国之初，在中央设立司译院，培养通习汉语的人才。社会上使用汉字也比较普遍。但汉字毕竟不符合朝鲜语的语音和语法结构，且字数繁多，字形复杂，难学难懂，使用有一定困难。当时朝鲜还有一种用汉字的音、意标记朝鲜语的“吏读文字”，但仍对汉字有较大依赖。世宗王即位后，命大臣郑麟趾、申叔舟、成三问等人深入研究韩国语语音。1444 年终于创制出新型拼音文字，定名为训民正音。训民正音在语音分类上受到中国音韵学的很大影响。其创制者在创制过程中深入研究了明初编撰的《洪武王韵》，并多次去中国辽东向明朝翰林学士黄赞请教音韵学。因此，可以说训民正音是中韩文化交流的结晶。训民正音的创制，开辟了韩国的翻译事业，大量汉文典籍被训民正音翻译过来，使韩国人民能够顺利阅读汉文典籍，进一步推动了汉文化在韩国民间的传播。

韩国在吏读和训民正音创制后，仍然有很多学者学习和研究汉语。韩国学者研究汉语的成绩颇丰。如 1449 年，申叔舟、成三问等人在研究和翻译《洪武正韵》的基础上，编撰《四声通考》；1517 年崔世珍的《四声通解》问世。18 世纪还有李德懋的《奎章全韵》等。可见，韩国学者为中韩两国语言学的研究和交流作出了很多贡献。相反，由于韩国在与中国的外交往来中一直直接使用汉

① 《世宗实录》卷 62，十五年十二月壬戌。

② 张存武：《清代中韩关系论文集》，第 318 页。

③ 《增补文献备考》卷之二百四十二，艺文考一。

字，中国学者研究韩国语的成果却较少。明朝曾在中央设立四夷馆，作为培养翻译人才和翻译外国外交文书的专门机构。明朝后期，中国已出版了韩国语和汉语的对译词典，并且开始培养韩国语的翻译人才。到清代，在四译馆（即明朝的四夷馆）中仍然设有韩国语通事官8人，另外还有韩国语译学生20人^①。不过，中国明清两代人对韩国语的学习和研究仍局限于口语训练和教学阶段。

(2) 程朱理学的传播与影响。理学是在儒学的基础上吸收佛教和道教的一些思想而形成的一种新的学术思想。朱熹是理学的创始人之一，因此，理学又被称之为朱子学。高丽时期传入到韩国的朱子学，在李朝初期分为两大派别。一派以郑梦周为代表的学者始终强调以义理思想为根本。另一派以郑道传为首的理学家则在批判佛教的同时，积极倡导以程朱理学来指导社会改革。尤其强调王命思想和变化论观点，为李朝代替高丽王朝提供了思想依据。因此在郑道传等理学家的帮助下，李朝自建国之初就以程朱理学作为制定内外政策的理论基础。从而确立了朱子学在朝鲜的官方哲学和正统学术思想地位。16世纪后，经过各学派的相互争鸣和论战，韩国形成了多种独立的理学理论体系，李朝的理学进入了兴盛阶段。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有李滉的退溪学和李珥的栗谷学。李滉（1501~1570），号退溪，被人们称为“韩国的朱子”。他曾倾注半生的精力，编撰《朱子书节要》，收集有反映朱子思想精髓和成学过程的1008篇朱熹书信的节要。在韩国和日本的理学史上具有重大影响。

李珥（1536~1584），号栗谷，著作有《天道策》、《圣学辑要》等。23岁时就对退溪学说中的理发气随观点提出异议，并在以后的文章中阐述自己的“气发理乘一途说”。他还在动静、心性、知行等问题上，拓展了理学各范畴之间的联系，他的学说被后人称为栗谷学。

(3) 中韩实学思想的交流及其影响。中国的实学作为一种独立的学派和社会思潮，发生于16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中期的300年间。实学是在明代理学空疏弊病的背景下产生的。所谓实学，就是崇尚实际、实效、实用的学风。这一思潮很快成为明末学术界的主旋律。韩国实学思想的兴起，是朝鲜

李朝后期的历史产物。17世纪，朝鲜理学中的学术争论，不但严重脱离社会现实，而且还常常演化为政治上的朋党之争。于是一些韩国学者便借助于从中国传入的实学思想、清朝的考据学以及西方科学技术的书籍，积极寻求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对策，力主学以致用。强调儒学中的“经世致用”和“利用厚生”思想，改良社会和救国救民，从而形成了韩国的实学思潮。

韩国实学的先驱者李睟光（1563~1628）曾3次访问明朝的北京，从中国获得很多关于世界形势和西方科学技术的知识。他于1614年出版的《芝峰类说》，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在韩国学术界树立了一种客观地考察各种事物和现象的新学风。韩国实学的鼻祖柳馨远（1622~1673），曾把毕生精力投入到各种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并在其所著的《磻溪随录》中提出以土地制度改革为根本的一系列改革主张，为韩国实学的确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受学于柳馨远的李瀾（1681~1763），号星湖，继承柳氏之学，并发展成为星湖学派。他强调学以致用，提出社会各方面改革的新方案。星湖学派中有不少人成为韩国实学学者，并将韩国历史文化的研究作为他们关注的重点，从而打破了韩国学术界唯理学独重的局面。如李瀾弟子安鼎福撰写《东史纲目》、《列朝统记》等研究韩国历史的著作。这些反映了当时韩国学术界关注民族自主和现实的思想倾向。

与星湖学派的实学研究领域不同，有一些实学学者则在与中国学者接触和交流思想的过程中，批判当时韩国的形式主义的虚无学风，明确提出向中国学习，以此促进技术革新和商品流通，通过发展工商业和海外贸易，增加国家的财富。这一学派在韩国称之为“北学派”，其代表人物有洪大容、朴趾源、朴齐家等人。此外，还有韩国实学的集大成者——丁若镛，在学术上反对“空理空谈”和形式主义，主张结合实际研究学问。进入19世纪，在清朝考据学风的影响下，韩国实学的研究领域逐渐集中在对经书、金石学和古典文献的考证。金正喜

^① 陈尚胜：《中韩交流三千年》，中华书局出版，1997年，第129页。

是这一时期韩国实学学者的典型代表。他曾于1809年随以其父金鲁敬为副使的朝鲜使团来清朝北京，结交清朝名士阮元（1764~1849）、翁方刚（1738~1818）等人，并拜阮、翁二人为师。金正喜在他们的影响下，在韩国也开拓了金石考古学的研究领域。他在韩国学术界特别强调，学术的最紧要之处在于实事求是。后人通常将金正喜为代表的实学学者称之为“实事求是学派”。但实事求是学派如同清朝的考据学一样，回避了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和社会改革。尽管如此，实学作为中韩文化交流的一个结果和韩国的一种新学风，曾对韩国民族文化的发展和走向近代社会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

3. 文学艺术的交流

文学艺术作为人类的精神文化，包括很多表现形式，如诗歌、散文、小说、书法、绘画、音乐舞蹈等。诗歌作为中国文学中产生最早的艺术形式之一，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它对韩国汉文学的发展也曾产生过较大影响。明清时期，李朝的文学相当发展，诗人辈出，作品颇多。如李朝末年张志渊所编的《大东诗选》12卷中，仅李朝的诗作就占了11卷^①。此时，中韩两国诗人的接触和交流非常频繁。双方的使节往来，常常借助于写诗的形式增进彼此的感情和友谊。李朝政府还专门选择能诗善文的官员陪同来访的明朝使节。他们之间相互唱和的诗文被李朝政府专门编为《皇华集》。明朝文人吴明济，在参加抗倭援朝战争后，专门在朝鲜收集新罗以来百余名诗人的作品，编撰为《朝鲜诗选》。这是中国人编写的第一部韩国汉文诗歌作品选集。此后，明朝编写明诗选本《列朝诗集》和《明诗综》时，选收50多部朝鲜人的诗作。这些反映出中国学术界对于韩国汉文诗歌作品的高度重视和积极肯定。

明清时期，中国的散文书籍大量输往朝鲜。特别是1776年李朝政府设置奎章阁后，朝鲜使节在清朝采购图书活动更加频繁。他们所购入的书册很多是明清的文集。李朝世宗王曾命令集贤殿学士撰集《韩柳文注释》；成宗王时，又命令校书馆大量刊印中国书籍，除了包括中国正史著作外，还有《古文选》、《欧苏文集》等散文书籍。成宗王时期的徐居正还曾把新罗以来的韩国汉文诗文编选成

集，定名为《东文选》。该书刊印后即传入中国。

除了诗歌和散文外，明清时期很多中国小说传入韩国，并在韩国广为流行。明朝后期，几部著名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都已传入韩国，得到大量刊印，有的还出现韩国语译本。在中国小说的影响下，一些韩国作家也开始创作小说，如金时习用汉文所创作的《金鳌新话》以及许筠用韩国语所创作的《洪吉童传》等。

随着汉字在韩国的使用，书法艺术以它独具的艺术魅力，为韩国人所喜爱。根据考古发现，韩国最早的书法作品为石刻碑铭。李朝中期，明朝书法家祝允明、文征明、王宠、董其昌等人的书法作品也传入韩国，并影响到韩国书法界。当时，韩国有柳成龙、赵涑、成守琛、李彦迪、金长生、李禹等书法家。他们的作品都体现了明末书法家们所共同追求的审美情趣。清代中期，在考古学风的影响下，书法也受金石、碑刻文物的刺激，由熟回生，返朴归真。这种书法风气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也开始影响到韩国的书法风格。

与书法相同，中国绘画也是一门借助笔墨表现线型的艺术。李朝前期，韩国画坛宗承中国北宗画风。安坚是15世纪韩国画坛的巨匠，他的名著《梦游桃源图》，题材来自于陶潜的《桃花源记》，画面则反映了北宋山水画家郭熙的风格。自17世纪开始，通过朝鲜使团的来华，不少中国南宗画作品流入韩国。此外，成书于明代的《画谱》和清代的《芥子园画传》等介绍中国画技法图谱著作也传入韩国，为韩国人学习中国画提供了基本图谱。在中国南宗画风的影响下，韩国画家们开始强调绘画“重在写意”，同时在题材上开始摒弃传统的中国山水画的理想山水，而直接以韩国自然景色为表现内容，从而塑造了以韩国事物为主题的韩国绘画风格。

二 明清时期的中韩文人交流

明清时期，中韩两国使节经常往来，而两国使

^① 陈尚胜：《中韩交流三千年》，中华书局出版，1997年，第216页。

者多为文人。到出使国后，多与该国文人学士广泛结交，切磋学问，从而结成深厚友谊，为促进两国友好关系起了巨大作用。

明景泰时，使节倪谦出使李朝，到达朝鲜京城，朝鲜名士申叔舟、成三问等争请赴宴，邀他作诗。倪谦的《朝鲜纪事》详细介绍了他在朝鲜出使的情况，也记述了他与朝鲜文人申叔舟的友好往来。张宁、董越、唐皋、黄洪宪等先后与李朝文人结交甚密，彼此切磋学问。当明朝使节回国时，李朝文人多作诗赠别。同样，李朝先后出使明清的使节，也都是学者、文人，尤其使节的随员如检书官，只有擅长诗文才能胜任。他们在华期间与中国文人广为结交，常与中国文人酬唱探讨，既得到改错的效果，又加强两国文人的联系。这些人在华时期写有大量诗文、游记，在中韩两国交流史上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公元1626年（李朝仁宗4年），金尚宪出使明朝，在济南与张延登相识，相交甚厚。金尚宪回国后，把自己观光中国的诗文送给张延登，张延登阅后，非常钦佩，除了为他作序外，还替他刊行于世。

公元1712年（李朝肃宗38年），金尚宪的曾孙金昌业随使来清。他与中国文人广为结交，彼此友谊深厚。他观光中国游记《稼斋燕行日记》是韩国的一部名著，系歌颂两国友谊的佳作。

公元1765年（李朝英祖41年），洪大容随任书状官的叔父赴京。他与中国文人严诚，潘庭筠、陆飞号等结识，尤与严诚交谊深厚。他们相识于琉璃厂书市，均被对方的儒雅气质所吸引，经过数日交谈，很快成为莫逆之交。在其后一个月的频繁接触中，他们时常促膝交谈或以诗文相唱和，结下深厚的友情。通过交流，洪大容了解到许多有关中国风土人情、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等情况。因严诚来自浙江，洪大容还了解到大量中国南方民众的生产和生活情况，这对于足迹仅止于北京的燕行使而言，更为可贵，弥补了不能亲自去中国南方的遗憾。严诚也通过洪大容了解到大量朝鲜风物。经过一个多月的交往，他们感情日益深厚，临别时还结为义兄弟并互相赠诗，赠画。洪大容回国后，不经几年，严诚病逝于中国福建。洪得知噩耗，异常悲痛，亲

作哀辞，托人捎到中国送给严家。洪、严二人的坦诚相交和真诚友谊被两国学者称颂为“洪严之交”，洪大容在其《湛轩日记》中真实地描写了与当时中国文人学者交往、互访的情景。

公元1766年（李朝英祖52年），李德懋随使赴京，与中国文人潘庭筠、李鼎元等结交，尤与潘庭筠相交甚笃，时有“潘李之交”的美谈。他与洪大容都是李朝英祖、正祖年间的实学家，与朴齐家、柳得恭、李书九合称“四检书官”，是实学派后期四位代表诗人，时称诗坛四大家。李德懋观光中国的游记《入燕记》，也是一部中韩友谊的珍贵史料。

公元1780年（李朝正祖4年），朝鲜著名学者朴趾源从其堂兄朴明源来华。他在中国期间，广交中国学者，多次与中国学者进行笔谈，研讨学问，交换各方面的知识，为促进中韩两国文化交流作出贡献。回国后，他根据在中国的旅行见闻撰写了26卷的《热河日记》。该书中，他详细介绍了清朝农业、畜牧业、商业、科技、医学、文学艺术等各方面的情况，这部巨著在当时中韩两国的思想界、文学界有很大影响。书中还叙述他与中国学者王民皋研讨学问的情况，比如两人连续交谈、探讨学问达6天之久，交谈内容十分广泛，古今中外、天文地理、文学艺术无所不包等等。

朴齐家于公元1778年、1790年两次出使清朝，柳得恭也于公元1790年、1801年两次出使清朝。此二人都是李朝著名文人，他们在出使清朝时，与中国学者纪昀、阮元、孙星衍、黄丕烈等广为结交，彼此经常在一起研讨学问，赠答诗文。纪昀、孙星衍都曾作诗送给朴齐家，而朴齐家回国后，也常与此二人通信，保持密切的关系。

其后，公元1809年（李朝纯祖9年），金正喜随其父出使清朝。他对中国文学修养很深，多次会见中国著名学者如翁方纲、阮元、李鼎元等。他回国时带去中国大量考古学著作，还长期与中国学者保持联系。当时翁、阮两人都是中国著名的考古学家，两人实事求是的严谨学风深刻影响了金正喜。他回国后致力于朝鲜古代研究，在朝鲜金石考古领域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获得“阮堂大师”的称号。

由此可见，明清时期中韩两国曾有很多才华横溢的文人学者进行过交流，留下很多宝贵的作品，为中韩文化交流史增添异彩。

三 结束语

中韩两国是同属于汉字文化圈、儒家文化圈的国家，由于地理上的相近和历史上的渊源关系，两国人民在相互接触和交流中，取长补短，曾共同创造出辉煌的东亚文明。明清时期，中韩两国在政治上建立的密切关系，加深了两国唇齿相依的友谊，进一步促进了两国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尤其是以中华文化为正统，自称为小中华的韩国人民，从未停止过向中国寻求知识的欲望。负载着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汉文典籍，源源不断地通过各种渠道流向韩国。韩民族正是通过汉文典籍大量吸收中华文化，并从中国引入先进的西方文化。在此，要特别提到的是随赴京使团来华的李朝文人学者，在与中国学者接触和交流的过程中，不仅在学术上、思想上带来巨大变化和发展，而且为本国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其形成一整套不同于中国的独特文化作出了贡献。

在历史上进行过文化交流的中韩两国，由于历史原因，曾在几乎半个世纪的时间内中断了交流。自1992年两国建交后，通过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进行频繁的接触和交流，各自寻求了本国的发展。但是两国的文化交流主要是在政府层面上得以进行。尽管现在双方的交流幅度日益加宽，而且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是深入研究双方，还需要很长时间。今后，要通过各种方式尤其是通

过民间层面上的文化交流，为两国的相互理解和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主要参考文献：

王其渠：《明实录》，《清实录》邻国朝鲜篇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1987年。

朴真奭：《中朝经济文化交流史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张存武：《清代中韩关系论文集》，台北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蒋菲菲、王小甫：《中韩关系史》古代卷，社科文献出版社，1998年。

杨昭全：《中朝关系史论文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

杨通方主编：《韩国学论文集》第三辑，东方出版社，1994年。

韦旭生：《朝鲜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陈尚胜：《中韩交流三千年》，中华书局出版，1997年。

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编：《韩国研究论丛》第四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朝鲜王朝实录》5，6国史编撰委员会编，1956年版（以下均为韩文）

崔韶子：《明清时代中韩关系史研究》，梨花女子大学出版社，1997年。

全海宗：《韩中关系史研究》，一朝阁，1986年。

韩国国史编撰委员会编：《韩国史新编》26、31、35卷，朝鲜文化部分。

李载夔、柳永烈：《韩国史大系》朝鲜前期5，三珍社，朝鲜前期文化。

（本文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当代韩国》编辑部编辑）

